

2025 年第 4 期（总第 83 期）



学 2025 科 动态



发展规划处、学科建设办公室

目 录

发展规划处、学科建设办公室编 2025 年第 4 期（总第 83 期）

战略规划

“十五五”时期我国高等教育阶段性特征及改革发展策略构想	2
-----------------------------------	---

案例解读

人文主义视域下法国人文学科建设和高校改革困境	11
------------------------------	----

趋势前瞻

在数智时代重思人文学科	26
-------------------	----

学界动态

复旦大学：开复旦文科新局	29
中国人民大学：承时代之问 建中国之学	30

导 读

“十五五”时期是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为加快构建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有力支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有必要系统分析“十五五”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的阶段性特征，以更好谋划高等教育整体改革思路和重大政策举措。深化新文科建设，既是建设教育强国、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核心任务，也是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内在要求。在数智时代背景下，如何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形成以育人育才为中心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新格局，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期《学科动态》选编学界部分专家的观点及记者观察，供读者参考。

第一小节“战略规划”选编了《“十五五”时期我国高等教育阶段性特征及改革发展策略构想》，文章从“十五五”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的阶段性特征入手，提出了“十五五”时期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策略构想。

第二小节“专家视角”选编了《人文主义视域下法国人文学科建设和高校改革困境》，文章通过对话的方式，分享了人文学科在世界范围内面临影响力边缘化的困境下，潘夏对人文主义、人文科学和法国教育研究体系之间关系的观察和思考。

第三小节“观点追踪”选编了《在数智时代重思人文学科》，文章指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文科也遭遇了全新的挑战，但数智时代的人文学科仍有其存在的独特价值和意义，它为人类知识系统和高等教育的更新提供了全新的想象空间。

第四小节“学界动态”部分，《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从范式创新、教育革新、定位更新3个方面介绍了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刚需性”重构。

“十五五”时期我国高等教育 阶段性特征及改革发展策略构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截至2023年，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4763.19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60.2%，提前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是世界高等教育规模最大的国家。高等教育服务国家战略和民生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彰显。“十五五”时期是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为加快构建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有力支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有必要系统分析“十五五”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的阶段性特征，以更好谋划高等教育整体改革思路和重大政策举措。

一、“十五五”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的阶段性特征

“十五五”时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关键时期，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将面临非常特殊的复杂形势和挑战。未来五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将加速演进，大国竞争空前激烈，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会不断升级。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发展，科技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密集活跃期。与此同时，科技革命与大国博弈相互交织，高素质人才和科技制高点成为大国竞争的关键领域。高等教育越来越成为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赢得战略主动的关键因素。同时，人民群众对享受公平而有质量的高等教育给予更高期盼，满足群

众对“上好学”的需要，任务更加繁重艰巨。总体来看，“十五五”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呈现出六个方面的阶段性特征。

一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关键期。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是建设教育强国的题中之义。从现在到2035年实现教育强国建设目标，时间跨度正好是“十五五”“十六五”两个五年规划。“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建设进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五年，其关乎两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其一，《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三年行动计划（2025—2027年）》明确，到2027年教育强国建设要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其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到202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八十周年时，要完成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其中包括高等教育领域的重点任务。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已经实现普及化，未来将从普及化的初级阶段转向高级阶段。但我国高等教育与教育强国建设要求相比，与满足国家战略需求相比，与有关发达国家相比，在教育理念、体系结构、师资队伍、课程体系、评价体系、资源保障以及治理体系等方面还存在差距和不足，高校办学特色不够鲜明，同质化发展倾向突出，仍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十五五”时期，要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深入实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更加注重结构调整、内涵发展和特色发展，为“十六五”时期高起点冲刺高等教育强国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二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攻坚期。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科技、人才的重要结合点，是培养高素质人才、提升社会生产力、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关键性力量。必须清醒看到，当前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还存在一些不足，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高等教育大而不强、科研成果多而不优、人才高地尚未形成、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体制机制不够健全等。“十五五”期间要以高等教育改革为战略支点，一体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工作，打破教育、科技、人才固有的观念边界、制度边界、体制边界、人员边界、资源边界，统筹推

进“三位一体”改革，推动教育科技人才系统性跃升。

三是服务国家战略能力提升期。高校战略服务能力是多方面的。从人才培养看，当前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存在结构性矛盾，学科专业设置与产业结构调整协同联动不够。据《中国集成电路产业人才白皮书（2019—2020年版）》预测，2025年集成电路人才缺口约30万人。据有关研究测算，预计到2028年我国人工智能领域人才缺口将达130万左右。近期，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印发《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方案（2025—2027年）》，对建立健全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机制和优化人才培养模式进行部署，不断提升高等教育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贡献力。从科技创新看，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校在国家科学技术奖通用项目、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占比较高，“十五五”时期可能成为科技发展若干领域的突破期，需要高校产出更多高水平科研成果，有效破解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回答好国家战略需求的重大关切。

四是学龄人口增长期。根据有关方面预测，“十五五”时期，我国18岁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波动上涨。“十五五”时期，高等教育18岁学龄人口的变化对高等教育带来多重挑战，一方面，高等学校需要在目前办学资源条件普遍比较紧张的情况下，深入挖潜扩大学位总量，提供更多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另一方面，要加强各类保障政策支持，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多样化、高质量的高等教育需求。

五是数字化转型加速期。当前，全球正经历一场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的信息技术革命，其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预计未来5年，这场革命将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特别是对教育领域将产生深刻影响。未来数字化将与高等教育加速融合，倒逼高等教育教学方式、教育资源与工具、师生角色、教育评价体系、科研范式及治理体系的变革。“十五五”时期，高等教育要主动适应数字化转型趋势，利用数字化赋能推动我国高等教育总

体水平再上新台阶。

六是高等教育治理变革期。履行好“十五五”时期的新使命新任务，需要进一步激发高等教育的生机活力，需要更新治理理念、优化治理结构和提升治理能力。政府要更加注重对高等教育的宏观管理，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并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高校要对内部管理制度和组织方式适时进行调整。如，为适应交叉学科发展，高校需要进行组织结构创新，打破传统院系壁垒，积极构建跨学院、跨学科的资源配置与共享机制。为促进学生自主发展和适应社会需求，高校应建立更加灵活多样的转专业机制，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十五五”时期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策略构想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谋划“十五五”时期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需要中期、长期与远期结合，将五年规划与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建成教育强国、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紧密结合起来统筹考虑。要重点围绕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的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在统筹教育改革发展全局的基础上，针对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和短板，明确重点发展任务和改革任务，夯实建成高等教育强国的基础，实现高等教育综合实力的跃升；着力突破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堵点”“卡点”，使我国高等教育的基本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十六五”时期及未来发展积累“实力红利”和“制度红利”。

系统谋划总体思路。在政治方向上，坚持党的领导，全面推进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在战略定位上，重点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突出高等教育在现代化强国建设中的基础性、先导性、

全局性、支撑性地位和作用。在宗旨意识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获得感更加充实。在发展思路上，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统领，以育人为本为根本要求，以提高质量为主题，更加注重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更加注重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科学合理设定发展目标和具体指标。紧紧围绕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以及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的目标，合理确定高等教育“十五五”时期的目标任务。期望到 2030 年，高等教育与国家战略需求、经济社会及人口高质量发展需求更加契合，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全面提高，高校办学特色更加鲜明，高等教育服务国家战略能力和民生保障能力显著跃升，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在总目标下，合理确定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学研究生数、每十万人人口本科在校生数、本科及以上理工农医类毕业生占比、高技能人才占比等指标，并做好与 2035 年预期指标的衔接。

规划和接续推进若干重大举措。在发展规模上，结合生源人口变化，适度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有序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和职业本科招生规模。在优化专业结构上，建立健全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机制。在质量提升上，实施高等教育提质升级行动，推动高校差异化发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在科技创新上，实施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突破计划，提高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能，促进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之间的协同创新。在高等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上，多措并举提高高等职业教育吸引力，提升高等职业院校办学能力，加快建设现代高等职业教育体系，为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输送一线从业人员。在数字化转型上，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促进人工智能助力高等教育变革。在教师队伍建设上，提升教师专业素质能力，特别是促进青年教师

成长发展，优化高校教师管理和资源配置，加大力度引进海外优秀人才。在对外开放上，鼓励支持选拔优秀人才到国际知名高校、研究机构研修，扩大中外高校学生交流，扩大国际学术交流和教育科研合作。在高校评价上，建立分类评价机制，引导高校发挥优势、办出特色。

完善支撑保障机制。建立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工作机制，统筹研究“三位一体”重大战略问题，制定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政策，建立一体推进督查督导机制。健全高等教育投入保障机制，完善政府财政性经费投入机制，适时适度提高高等教育生均拨款标准，完善多主体经费投入激励机制。逐步提高基础研究预算支出比重，优化高校基础办学条件改善机制，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加快推进高校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高等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和高校章程，全面推进依法治教。探索高校内部治理模式创新，健全民主决策机制，有效释放创新活力。

作者简介：王辉，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原司长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时报》2025年9月23日

人文主义视域下法国人文学科建设和高校改革困境

在当代社会，日新月异的技术，尤其是信息通信技术，极大程度地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深刻影响甚至动摇着人们既有的社会交往和价值判断模式。事实上，人文学科专业招生规模缩减、经费削减等影响力边缘化的表现早已在西方社会出现，而现在，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冲击下，“文科专业倒闭潮”也成为中国的热点话题。潘夏教授认为，西方人文科学界面临困境的深层次原因是人文科学中人文主义传统的边缘化。尽管人文主义对于促进社会理解与和平具有重要价值，但是这一思想传统事实上已经面临衰落。在这一背景下，为了深入了解人文主义和人文学科的多维度价值，本文通过对话的方式，分享潘夏对人文主义、人文科学和法国教育研究体系之间关系的观察和思考。值得注意的是，在访谈中，潘夏多使用更强调科学研究的“人文科学”，而非更强调教学的“人文学科”，本文在引述他的观点时会使用前者，而在表达与高等教育学科内的观点时使用后者。

一、人文主义在当代社会的重要性

关于当代社会面临的危机，潘夏尖锐地指出：现在处于世界历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令人震惊的不仅是知识体系的瓦解，还有无法控制的非理性暴力的出现。人文主义不仅是一种知识，也是一种遏制和教化粗暴的方式。但当代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把“批判性”计划与彻底摧毁制度的意图混在一起。他们强调地球的自然平衡濒临彻底毁灭，但却使我们的社会生活首先受

到威胁。生态主义——原则上致力于保卫地球——往往成为激进主义的一种形式，后者自认为掌握真理，却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真正缺失的不是地球的未来，而只是减少自我仇恨、增加自我欣赏的意愿。

在这样的背景下，潘夏认为，应该重新理解人文主义的深厚内涵。他指出，人文主义创始人之一、意大利人皮科·德拉·米兰多拉以成为和平的使者自许，倡导“和平的世界主义”，并被称为“和谐伯爵”。正是在皮科的伟大愿景下，人文主义作为一种对文明的整体研究被建立起来，成为西方人文科学的基础。潘夏指出，人文主义首先建立在知识之上，这种知识不是任意一门人文科学的知识，而是作为整体的古典文献知识。古代语文献是进行真正的比较研究的唯一途径——不是与外部的其他文明进行比较，而是内部的比较。对于西方来说，就是在西方文明与自身的比较中进行研究。他指出，法国的古代语言知识水平正在衰退，而任何人工智能都无法弥补这一缺陷，因为人类经验的真正智慧并不完全基于字符的排列组合，而是基于字符的含混性，只有基于历史的文化活动才能调动和利用这种含混性来使意义更丰富和更复杂。换言之，算法可以把握它所处理的语句的外延，却无法进入其内涵。无论我们称之为“敏感性精神”或是“类推的智慧”，正是这种文字背后的内涵维系着文明的传承。因此，我们绝不能将人文主义与所谓“数字”的人文研究混为一谈，后者只是处理文献语料库大数据的研究，只有数字人文研究不足以支撑人文主义问题域。

同时，潘夏也强调，这个问题域不能局限于诉诸一套普世价值观，即使这些价值观是以《人权宣言》的各种形式为基础的。人文主义是一种关于人们数千年来的文化生活的知识，在这种生活中，人们通过语言、文字和道德与法律体系实现文化的交流和实践。比起塑造人，人文主义更致力于理解人，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值得深思。这种知识系统起初可能被称为“古典文献研究”，

但当它在这种源头知识和对文明史反思的基础上，显示出自己能够追溯人类发展的统一性并注意到这种发展中的不变因素时，它就成为了一种哲学，一种思考的方法。这就是说，人文主义是一门关于人的科学，并且在将这门科学延伸为对人类能力的思考时，借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它就成功地阐述了一系列关于精神在历史中作用的理论。

因此，人文主义不仅仅是一种“考古学”，也不仅仅是一种关于自由的道德观或其他道德观；它是整体人类经验的发展历程，这种发展背后有一种理性的准则确立了它的构架基础。我们可以称之为人类事实的形态学和历史的组织理念。正是在此基础上，潘夏指出，人文主义的首要任务就是让人类的存在状况得以延续。如果人文主义获得广泛影响力，它可以成为发扬人们美好意愿、对抗社会分裂的力量。然而，它却在当代学术研究中被边缘化。

二、法国人文科学的演变与偏离

具体到法国人文科学界的情况，潘夏认为，这种对人文主义的边缘化是在人文科学的发展历程中逐渐完成的，如今的法国人文科学已经越来越走上了与原本作为基础的人文主义研究南辕北辙的道路。

潘夏首先指出，人文科学在很大程度上诞生于法国，欧内斯特·勒南的宗教史、涂尔干和塔尔德的社会学、葛兰言和马伯乐的汉学、本维尼斯特和安托万·梅耶的印欧语言学，以及马塞尔·莫斯的民族学，都可以认为是人文科学的奠基石。当然，还有更多本文没有提及的学者。这一继承了人文主义思想传统的科学系统可以涵盖整个 20 世纪的法国文化。杜梅齐尔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为这一有影响力的学派找到了支点。然而，在二战后社会变革和冲突的影响下，这种影响深远的科学和人文文化发生转向，在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的启发下成为了挑战西方文化传统的阵地。在福柯、德勒兹和德里达等作家的推动下，这种结合在法国催生了所谓的“68 思想”，塑

造了一种反叛性的思想风格。这种思想风格之所以格外有力，是因为它不仅影响了法国大学界，还传播到了美国，并在不同程度上孕育出了“觉醒”的意识形态。

潘夏观察到，如今西方的人文科学更接近于一种支持少数群体权利的斗争，而其理解社会现象的功能却逐渐弱化。这种变化使得人文主义变得无足轻重。更糟糕的是，这种斗争已经变成反对民主计划及其普遍平等目标的力量象征。这在法国两个高等研究机构的变迁中可见一斑：1968年5月之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从专门从事古典文献研究的实践高等研究学院中分离出来；巴黎政治大学原本旨在培训社会领导阶层，如今却被推崇为对社会状况发表“真理性”言论的典范，而这既不是其初衷，也不是其能力所及。

潘夏认为，人文主义首先建立在知识之上，只有当它成为记忆的守护者，守护成为文明发展根基的长远记忆时，它才能具有行动上的积极性。如果人文科学的唯一作用只剩下动摇文明，它们就会失去与人文主义的联系。而在今天的法国，这种联系的断绝正以两种方式表现出来：其一，拨给历史学和古典文献研究的资金减少，转向了认知科学和统计社会学研究；其二，古代语言知识水平面临着几乎不可逆转的丧失，并且这种丧失是无法通过人工智能等技术工具的使用来弥补的。

人文科学的影响力在全球面临衰退，一些政府和研究机构推出了各种方案提振人文学科，有的重在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技术，包括认知和神经科学的融合，如美国杨百翰大学的“人文+”项目；有的推动人文学科的应用转型，如日本的“网络型文科类研究生院”计划；有的着眼于人文学科的大众传播，如挪威奥斯陆大学的“2030年”人文计划。虽然全球高校推出了各种应对和解决方案，其中亦不乏法国高校，但潘夏认为，法国当前的高等教育体系没有能力采取有效手段解决人文科学日渐偏离人文主义传统带来的问题。

潘夏不讳言地指出，法国大多数优秀的研究人员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靠（作为共同体的）欧洲提供的资助来发展自己的工作。然而，欧洲研究理事会只关注解构西方文明的话语，如“文化研究”“去殖民研究”、激进女权主义、性别理论和少数族群权利。如前文所述，这些研究领域不是从知识出发到批判，而是从一种对西方文明的强烈批判立场出发，其批判的意图坚定，以至于知识的时刻总是被延迟，让位给无所不在的行动主义。所有的话语在还来不及建立自己的稳定基础之前，就根据其政治意义和媒体影响进行评估。这就是所谓的“政治导向型”知识，或者用英语说的“政治推动型”知识。

作为例子，潘夏提到法国的东方学研究。在19世纪，法国人对东方的研究基于对异域情调和殖民时代旅行的热情，这为艺术创作开创了空间，无论是德拉克洛瓦的绘画还是波德莱尔、杰拉尔·德·内瓦尔和谢阁兰的诗篇。在中国研究方面，谢阁兰曾为异域文化的创造性进行辩护。随后，萨义德和弗朗茨·法农对这种东方主义提出挑战，甚至将其转变为一场争取人民解放的反殖民主义斗争。在争论中，一些基于人文主义方法的东方学研究成果，如亨利·柯宾、他的老师马西尼翁，以及他们的后继者克里斯蒂安·让贝的工作被边缘化，如今让贝的工作更多地受到法兰西学术院法语文学研究者的称颂，而不是东方语言专家和欧洲以外文化专家的认可。

相反的是，潘夏注意到，巴黎凯布朗利博物馆的创建——这是一座致力于“原始艺术”研究、由原总统希拉克倡导、直接承袭列维-斯特劳斯民族学研究工作的博物馆——在理解非欧洲世界方面提供了一个平衡点，它直接继承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建成的旧人类博物馆的藏品。吉美博物馆的藏品也是如此，该博物馆专门收藏亚洲艺术品，在研究亚洲、非洲、大洋洲和美洲文化方面有着辉煌过去。这也许说明，即使被边缘化，人文主义传统依然存在于法国人文科学的系统之中。

三、人文主义哲学是人文科学的基石

法国的人文科学逐渐偏离了其诞生时所继承的人文主义传统，但潘夏指出，这不代表人文主义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人文主义在人文科学中发挥的根本性作用深入到哲学的层次，因为人文主义也是一门哲学，而且是关于人的事实的哲学，而后者正是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

潘夏指出，在法国，由于对文学文化的尊重和对精彩演讲的热衷，哲学仍然主导着国民性的辩论。但他强调，这背后真正的原因在于哲学知识跨越了近三千年而没有中断或被遗忘。新哲学总是对旧哲学的恢复和重新整理，正是这种不断的重新诠释使哲学能够抵制学科的分散和科学的“区域化”主张，而这些与哲学的普遍性相对立。在这方面，自吉尔松的开创性工作以来，法国在哲学史，尤其是中世纪和古典哲学史方面的知识生产一直很出色。关于思想资源的知识并不脱离思想的发展，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德勒兹的著作以对康德、休谟、柏格森、斯宾诺莎和尼采等过去的哲学家的非凡原创性表达开始，以对莱布尼茨的概述结束。近年来，在英语学术界的影响下，法国思想与哲学史渐行渐远，尽管法国的现象学运动继承了海德格尔对“存在的历史”的研究，依然与哲学史保持着紧密的联系，马里翁关于笛卡尔的著作就体现了这一点。

潘夏强调，哲学的目标是使理性得到正当的使用，因此它绝不是一门单纯的人文科学；相反，它为人文科学的认知论有效性确定了条件，因为它界定了知识的范畴，即科学的一般秩序。一旦确定，这种认识论秩序就可以应用于人类科学。将哲学建立知识的一般条件与“人的科学”计划相协调的思想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法国哲学家马勒伯朗士。孔德的“实证哲学”思想也是一个类似的方案，尽管其代价是对绝对科学（如马勒伯朗士的形而上学）思想的激进批判。尽管如此，人文主义哲学原则上拒绝实证哲学与形而上学

之间的对立，力图将人的科学与终极目标的确定结合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文主义哲学继承了皮科·德拉·米兰多拉关于人的尊严的哲学的庞大计划。这种尊严源于人“无限”的潜能，因此，无论是真、善或美性质的尊严，都建立在人类心灵与无限本身之间的基础关系之上。这也是使人文科学得以成立的一个基石性问题。

但人文主义哲学的发展也不是顺理成章的，潘夏指出，它始终处在历史现实与理性逻辑的交织中面临重重困难。在法国，人们谈到哲学总是从笛卡尔开始，但笛卡尔却实实在在地阻碍了这种人文主义哲学的发展：笛卡尔固然深化了作为确定性来源的知识证据领域，但他却将人类记忆的深厚遗产抛弃到了不确定的领域。从那时起，法国的人文主义思想往往更多地出现在夏多布里昂、巴尔扎克等作家身上，而不是专业哲学家身上。可以说，人文主义的斗争就是不断从文学中取回这些宝贵遗产，为构建人类精神的形而上学寻找新的理性根基。他认为，在皮科之后，那不勒斯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维科在其《新科学》的几个版本中最好地实现了这一计划。事实上，《新科学》也确实有先驱意义地启发了历史学、语言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这部巨著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翻译成中文。但随着20世纪的世界动荡，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研究走向了彻底反人文主义的方向，阿尔都塞和福柯也持类似思想。

对当今法国的人文科学界来说，潘夏指出，布尔迪厄学派保留着理解社会矛盾的真正计划，但他们拒绝接受人文主义设想给出的方案，将其视为资产阶级的幻想。埃马纽埃尔·托德和卡尔桑提更多地受到西方文明危机的启发，但他们并没有致力于形而上学与人文科学之间必要的联系。至于拉图尔，他在自己的社会学研究中加入了环境学的因素，并把某种形式的灵性保留在个人领域之中，而这并不构成人文主义方面的哲学觉醒。不过潘夏认为，在

当代音乐艺术领域，尤其是声音实验主义中，尽管其技术性往往多于表现性，某些人文主义哲学的元素被引入其中。如皮埃尔·布列兹的作品就可以在这个意义上被重新认识。

总之，尽管人文主义哲学实际上承担着人文科学的终极面向，但在人文主义的古典文献研究基础——关于语言和历史的知识——全面衰落的当代世界，它的未来仍然非常不确定，潘夏重申，单纯人文科学的发展并不能与人文主义的发展混淆。

四、法国高校改革对人文科学发展的利与弊

20年来，法国政府持续推进高等教育改革。一方面，不断推动高校自治和重组，推动大学合并、联盟，以及与其他科研机构的合作。从全球大学排名看，这种重组带来了法国高校排名的提升。另一方面，大力推进法国高校走向国际化，促进欧盟学者与学生的交流，以及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的深度合作。但潘夏认为，这些改革措施给人文学科带来的不全是好处，如果忽视学科自身发展的特殊性，也会导致资源错配乃至人才流失。

潘夏直言不讳地指出，他担任让·穆兰里昂第三大学哲学学院院长时，坚决反对将里昂第一大学、里昂第二大学、里昂第三大学、里昂高等师范学院和圣埃蒂安大学合并的计划。因为他深信，卓越的研究并不依赖于大学结构的扩张，而是来自于单一机构的长期经验，单一机构虽研究范围狭窄，但可以长期集中于一项有经验的工作。虽然合并计划中止，但潘夏指出，研究的活力还是受到了严重影响。

潘夏强调，合并使大学更容易受到欧洲机构的监管，因为只有欧洲研究委员会等相关机构才有能力提供与这些庞大结构的需求相称的资金。这使得学术方向上依附变得更加严重，研究人员也失去了自主权。由于欧洲的资助以及欧洲共同体在法律和地缘政治事务中维护其意识形态的利益，有些规模

很小的研究却得到了过多的支持。简言之，即便经过合并与重组，真正的知识依然首先产生于拥有传统图书馆的老牌机构，而那些具有强大媒体影响力的跨学科项目，虽然为大学提供了有用的资源，学生可以在这些项目中广泛接触不同领域，找到自己的研究方向，但这些项目的科学水平很低。

潘夏指出，在这些兼并战略中，他看不到任何人文主义的主张。这种模式首先来自工业界，以及通过兼并和收购进行的资本重组：这将对学习投入要求不高的智力工作与需要大量学习时间的深度知识生产混为一谈。他重申，人文知识不需要大规模的投资，而需要以传统经验为基础的稳定结构，只有足够深厚的经验可以使投入研究的学生承担的风险变得可以接受。因为在这些研究中，人文自身的科学规律优先于生产策略，并非投入时间就一定可以得到相应的成果，不稳定性将伴随研究者的一生，因此他们需要从职业生涯一开始就得到保护。

对于法国促进学生在欧洲地区的国际交流，潘夏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但也表达了他对人才流失的担忧。他始终认为，教育的未来就在于国际交流。欧盟的伊拉斯谟奖学金塑造了一代学生的国际生活。对于人文主义来说，旅行是整体人文主义计划的核心，因为它使人们能够认识到不同社会的绝对特殊性。知识分子的身份在旅行中得到加倍确认，因为旅行既是认识他人的过程，也是认识自我的过程。

此外，潘夏强调，需要区分体验跨语言环境的国际交流和以博士后为基础的海外研究计划。博士后的含义完全不同，它涉及作为研究者投身于一个外国机构的研究计划。简言之，提供博士后的大学将研究人员的劳动力完全投入到大学的研究项目中，这使一个国家培养出的研究人员及其研究方法为其他国家所用，这无异于是对一个国家智力潜力的最大掠夺。

潘夏指出，遗憾的是法国不再有能力为自己在国内培养的研究人员创造

更多岗位。因此，法国实际上在为其他国家培养人才、提供扩充研究的力量。旅行变成了迁徙，迁徙变成了利用，不再是为了研究而旅行，而是为了经济移民。潘夏希望看到，至少研究人员在新机构工作几年后能够回到培养自己的大学。但他也观察到这种回国现象很少见，而且更多是基于个人或家庭的决定，而不是受到了法国吸引力的影响。他担心，欧洲注定要面临一种国际迁徙，欧洲大陆最优秀的人才才会离开欧洲。但他也承认，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归咎于欧洲人，因为他们将自我憎恨作为研究的动力和求知的动机。因此，他们削弱了自身的力，并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动摇自身卓越所依赖的基础上。

潘夏最后指出，思想大迁徙的时代已经到来。只有在无数考验之中，人文主义的时代才会来临，因为人文主义的传统遗产无法被简单复制，必须其他地方以不同的方式重建，才能孕育一种不满足于处理抽象概念和形式主义的创造精神，这种精神扎根于民众，并且致力于服务民众。在这里，潘夏提出的一个典范是在美国东海岸，特别是在纽约蓬勃发展的意大利人的精神，他们借鉴文艺复兴的传统，创造出巨大的、光彩夺目的摩天大楼。这些大楼构成了当代建筑风格基础的一部分。

作者简介：布吕诺·潘夏，法国里昂第三大学哲学学院原院长、荣休教授；王治博，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让·丕平中心博士研究生；张力玮，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三刊副总编、《世界教育信息》主编

文章来源：《世界教育信息》2025年第7期

在数智时代重思人文学科

引言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人类进入了当代意义上的科学时代，实证主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工业化全面重塑了人类生活。及至一百多年之后，科学及其成果早已从蒸汽机和电灯、电话拓展为互联网、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数智时代的新技术，人类生活也沿着永不停歇一路向前的路径实现了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成为社会和时代的主旋律，人文学科的节节败退、不断被边缘化也在同时发生。无论是高唱“人是机器”的工业革命时代，还是以科技和军工优先的冷战时代，抑或是其后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大行其道的后冷战时代，“文科无用论”总是被不断提及。

及至今天，当人工智能技术门槛不断降低，全面介入个体的日常生活和工作运用时，“文科无用论”又一次在媒体上和民众中甚嚣尘上：诸多国外名校纷纷缩减文科院系的规模，停招文科专业，文科生就业举步维艰。这与人工智能相关专业在全球高校中呈爆发式增长、人工智能在大众媒体上受到狂热追捧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一情境与近一百年前埃德蒙德·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所描述的场景十分相似，这位现象学的创始人注意到了当时“形而上学不断失败与实证科学的理论和实践的成就锐势不减地越来越巨大的增长之间荒谬的令人惊恐的鲜明对比”。

当年的布伦塔诺、狄尔泰、文德尔班、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前赴后继地展开科学批判，捍卫人文教育的价值和地位。今天，当数智技术大行其道，全面革新知识进路、教育方式以及个体和共同体的生存经验时，我们应当更

为审慎地思考人文知识和人文教育的当代价值，以回应“文科无用”的时代论调。

一、如何看待“文科危机”：思想史的回顾

“文科无用论”并不是今天提出的新说法，而是在19世纪现代科学勃兴，科学主义、客观主义、实证主义逐渐成为社会共识时就出现了。在科学意识形态的改造下，现代知识系统按照自然科学的标准进行了重新的组织，是否符合科学的价值标准成为知识的首要前提。然而按照自然科学的标准，在前现代占据人类知识系统主要位置的人文科学无论从研究方法、知识进路还是成果成效上都无法与技术科学相提并论。当时的自然科学研究在经验主义归纳法、实证主义等观念的支配下，确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对象观察和实验方法，并用数学的方式对观察结论进行了精确化描述，这些研究手段和知识进路在传统人文领域中几乎从未出现。在知识进路上，传统人文科学多数停留在独断论或者文本诠释的层面，而自然科学则早已具有经验归纳和实验观察的新工具，所得出的科学结论也能够被经验所证实。在研究成效上，自然科学得出的科学结论能够借助于资本主义生产转化为实际的科技成果，全方位改造了普通人的生活方式、提升了普通人的生活水准，提高了生产效率，这都是人文科学望尘莫及的。因此面对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在其自身的存在合法性上面临一种窘境，哲学家卡西尔指出，这导致了知识系统的某种危机：

歌德和黑格尔逝世以后迄今这一百年中，哲学和科学陷入了一种内在的危机。最能显示出这一危机的，莫过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

19世纪中叶，以狂飙突进运动结束、德国古典唯心论体系崩溃为标志，整个欧洲的人文科学开始转入低潮，自然科学开始突飞猛进。唯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成为统治性的意识形态。当时的人文学者纷纷从不同的角度捍卫人文学科，比如以特兰德伦堡、布伦塔诺等为代表的哲学家赞同自然科学的经

验主义研究方式，认为哲学和人文科学应当学习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严格性，但同时他们也强调了人文学科知识的特殊性。而狄尔泰则用“精神科学”标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反对实证主义方法在人文科学中的使用。在他看来，关涉到人的认识、行动和价值的精神科学是描述的、阐释的，而不是实证的，由此开辟了诠释学的传统。他主张以整体性的“生命”为出发点，生命是不可被还原、化约为纯粹的外在经验研究的。他说道：

只要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声称通过从歌德的大脑的结构、或者从歌德的各种身体特性出发，把歌德的各种激情、诗人的创造力，以及理智性反思推导出来，就可以使歌德的一生变得更容易理解，那么，这样一种学科所具有的独立地位就不可能受到质疑。

在狄尔泰看来，生命不是纯粹物质或者生理的器官拼凑，而是一个统一体或整体，不容许有任何肢解。自然科学的方法靠“因果说明”，是认知活动，而精神科学的方法则是靠“同情理解”，是“阐释”。由此他刻画了与自然科学截然不同且不可或缺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独特领域。

如果说狄尔泰是为精神科学划定了相对于自然科学的领地，那么胡塞尔的想法就更进一步。这位现象学的创始人不仅说明了文科危机的本质是工具理性的滥用，还进一步说明科学所信奉的客观世界实际上是奠基在主观领域之中的，因此哲学和人文科学不仅仅是要与自然科学划界而治，更要成为自然科学的基础。

胡塞尔认为，自然科学意识形态下的客体主义实际上意味着一种（非理性的）信仰，即相信能够通过一种恰当的方法超越一切主体相对之物，要求一种关于自在世界的知识的直接把握。其基本动机在于，以一种绝对客体化的方式把握世界的起源，而否定承担科学的主体性和为客体化世界奠基的意义构建的主体层面，或者将二者的奠基关系倒置过来，即认为普全的客观世

界是先在的真理，是主体认识和意义构建的基础。其后果是自然科学占据了人类生活和世界的奠基性地位，同样作为科学形式的哲学和人文科学不得不遵循客体主义方式接受改造（如心理学），或者被直接摒弃。

现代自然科学意识形态尝试通过理念化和客观化手段，最终构建一个无限的客观世界，这个客观世界与主体绝然无关，但是这种单方面的投射却没有将审视的眼光反诸自身。客观世界最终还是来源于主体相关的、视域显现的原促创，并且只是其中的一个特殊视域，说到底，自然科学也是生活世界中的一个文化构成物，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成的认识态度——自然主义的极端化和绝对化实际上是理性滥用的幼稚行为。从这个角度，胡塞尔试图以意识现象学的方式论证某一个具体历史中的思维方式只能处于相应的范围中，任何超越具体历史和范围的绝对化尝试都会带来灾难。因此文科的危机实质上是欧洲科学的危机，也是欧洲人的危机。导致文科危机的自然科学意识形态化实际上只是主体众多可能性的一种，因此认识和把握主体的丰富可能性，是抵抗理性滥用的唯一道路。胡塞尔号召：我们应当“使潜在的理性达到对它自己的可能性的自身理解……这是将形而上学或普遍哲学引向实现的勤奋的道路的唯一方法”。

二、审思当代的“文科无用论”

今天的“文科无用论”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19世纪文科危机的延续。比如，二者在外部条件上相似，都是技术科学的突飞猛进、新技术支配市场和个体日常生活，引发了一种公众广泛认同的技术科学崇拜，导致人文科学在社会生活和知识体系中不断被边缘化；二者在价值效用上相似，都导致了技术科学价值的单一化，导致个体和共同体生活的意义匮乏等等。但同时，由于数智时代的新技术与19世纪工业化确立阶段的技术相比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因此当代的“文科无用论”也显示出一些狄尔泰和胡塞尔未曾经历过

的新问题和新效应。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引起的人类知识乃是思维活动的大规模外包，互联网和信息技术深刻改变了主体间的交流模式和主体接受信息的模式，这对于共同价值凝聚和共同体建构产生了强烈的冲击。这些新的问题和经验引发的是对传统人文学科知识进路和教育方式的质疑。在这个意义上的“文科无用论”，实际上是对传统人文学科的批判，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当我们捍卫和论证人文学科的价值时，至少应当充分重视或部分接受后一点意见，即古老的人文学科也应当充分回应时代的变化，再对新问题和新经验及时作出回应和阐释。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文科无用论”在局部范围内是有其理据的。首先，自19世纪人文学科的研究和教育普遍进入大学这一职业系统之后，人文科学的职业化和学院化对于人文知识本身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学院化的文科研究和教育越来越与社会日常生活脱节，越来越多的文科学术研究停留在经典文本之中而非在现实中寻找问题。人文科学研究的成果越来越偏重理论、制造文本概念，形成学术圈子内部的内循环，但是理论、概念和文本缺乏公共性和现实关怀，对于社会现实和日常经验缺乏阐释能力，无法应对时代问题。相应地，在这样一种学术和研究下培养的专业学生，既缺乏学以致用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无法适应当下的社会职业需求。这样一种文科学术确实“无用”。

此外，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社会的伦理、价值、制度系统都是由人文科学提供的，这些伦理、价值和制度与社会生产发展水平和人类共同体的认知水平相适应，并且规范了社会生产和人类认知。但是今天我们面临的是新技术的飞速发展，这与农业时代的生产发展和认知提升速度已有天壤之别，后者一个变化可能需要几代人乃至几十代人才能实现，而今天的新技术从出现到产业化普及的时间则越来越短。从知识的更新到技术的更新，再到人类

日常生活的变化，其间的联动越来越快。人类从第一块石器工具的使用到发明蒸汽机，用了大概 300 万年，从电灯的广泛使用到人工智能的普及却只用了 100 多年。在这样一种飞速的变化之下，人文学科并没有及时更新自身的知识进路和研究方式，仍是以传统的方式来延续自身的学术传统，因此跟不上这样的变化，也就无法为社会发展和认知提升提供及时有效的伦理、价值和制度。人文学科相对于新技术发展的滞后造成了其在这一领域内功能角色的缺失，相应引起的社会问题也愈加明显，比如对于人类基因编辑的伦理规范，对于新技术引发的可能的社会不公的预防等等，在这些问题上人文学科专家没有及时作出思考和回应，而是让科学家、政治家和社会大众凭借日常经验作出处理，难免会给人“文科无用”的印象。

但是如果我们剥除掉文科自 19 世纪以来在学院化和职业化过程中逐渐脱离日常生活，以及当代明显滞后于新技术发展这样的时代特征引发的问题，就人文学科和人文知识本身而言，“文科无用”并不成立。对此，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文科无用”这一命题本身的意义，即这里说的文科对人类共同体无用，对个体无用，还是对大学无用？是在普遍意义上作为人类知识类型的文科不再有继续存在的必要，还是在特定意义上或特定前提下失去了价值？

一般而言，对于人类共同体来说，在前工业时代，人文学科所涵盖的知识占据了人类知识的绝大部分，包括观念和意义系统的建构、信仰的凝聚、文化的传承等等，无论是农业社会，还是近代的工业化社会，抑或是当今的新技术时代，这些知识对于人类共同体的形成和维系仍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即便当人类进入科学时代，人文学科对于生命整体、主体视域、人生意义等的思考和回答，仍然无法忽视，狄尔泰和胡塞尔对于人文学科的捍卫依然有效。具体而言，对于个体而言，人文学科的知识是从童蒙教育到公民教育中最为基础的部分，从识文断字到经典阅读，到审美品位的习得，

再到正确价值观的确立，无不是文科的教育范畴。尽管今天人文学科的大部分知识可以外包给人工智能体，但是至少在可见的未来，作为个体教育内容的人文知识仍然不可或缺。最后，对于大学而言，无论是11、12世纪欧洲的教会大学，还是起源于唐宋的书院，今天意义上的人文学科涵盖的知识都是当时这些高阶层教育的主要内容。从19世纪时至今日，除了专业技术院校之外，一般的综合性大学都会有人文学科的立足之地，在通识教育、信仰教育、价值观教育中人文知识也在持续性地发挥作用。因此在普遍意义上，“文科无用”并不成立。

因此，今天我们说的“文科无用”，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审思。从积极的方面看，“文科无用论”敏锐地指出了近百年人文学科过度学院化且严重滞后于技术和科学知识更新的倾向，当人文学科的研究和教育变成了与社会现实无关的、纯粹限定在学院内部的文本和概念的内循环时，当人文学科无法规范技术的飞速发展、无法回应新技术的伦理价值缺失时，文科确实是无用的。就这一方面而言，面对“文科无用论”，当下的人文学科应当积极实现自我转变。首先，人文学科要突破学院化限制，恢复公共面向，直面时代现实问题和个体经验。其次，人文学科应当积极回应技术时代的变化，在知识进路、论域、研究方式等各方面实现自我更新，强化学科交叉，以实现人类社会和传统文化传统中变与不变的平衡。

但是另一方面，在一般意义上看，无论对个体、共同体，还是大学，人文学科知识的有用性仍然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今天的“文科无用论”毫无疑问有其偏狭和盲目之处。当今的“文科无用论”，更多是AI技术在大众生活中产生广泛影响之后的论调。越来越多几乎没有使用门槛的AI产品可以写文案、设计图像、整理文献、生成视频，其工作的效率和效果大大超过人力。因此从职业需求上看，很多人认为文科的知识传授和掌握对于个体变

得不再必需，以往深藏在故纸堆里的深奥学问今天通过 AI 可以轻易地被编织进文案，烦琐的文员工作动动手指就能一键生成，因此文科可以被淘汰了，文科的学习者也难以有好的就业前景。但是必须指出，AI 技术带来的知识危机和就业焦虑绝非仅限于文科，像程序员这样的理工科岗位面临的危机并不见得比公司文员要小，传统的技术和体力劳动者，比如流水线工人、司机、建筑工人、护工、快递员的职业角色在新技术突飞猛进的背景下已肉眼可见地即将消失，甚至医生这样的职业也面临被 AI 取代的风险。这些职业跟文科教育并无直接关系，只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演进，职业形态进行着自然转化，当然这个变化的速度比两百年前要快得多。

因此如果更宽泛地看，AI 时代我们说的“文科无用”，实际上呈现的是整个社会对于“AI 有用”的狂热且盲目的技术崇拜，是缺乏恰当理解力和知识远见的公众的集体选择。按照这一逻辑，不仅文科知识无用，理科、工科、农科、医科知识也无用，所有传统的人类知识形态和知识进路都无用，因为 AI 可以取代一切。在这个意义上，“文科无用论”更多的是媒体对人工智能产业化的少数成功案例进行过度炒作后在社会上形成的认知误区。这样一种舆论氛围过度宣扬 AI 全能，实际上完全没有看到 AI 技术底层的知识架构和知识积累，也没有看到新技术产业化背后大量基础理论研究的科学基础，这样一种狂热的技术崇拜拉低了整个社会的认知水准，对于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新技术的发展也毫无益处。在这个意义上的“文科无用论”，无论其在现实的教育政治中有何种回应和支持，都是我们要坚决批判和抵制的。

三、文科教育的当代价值

当笔者向 DeepSeek 提问“如何看待中国当下的‘文科无用论’”时，它经过“深度思考”后给出了如下一段话，经过笔者稍作调整，完整录于此：

中国的“文科无用论”可以被看作现代化进程中，随着科学意识形态化

的不断加强，效率与价值、工具与意义的冲突缩影。从新文化运动的“砸烂孔家店”到九十年代的“知识无用论”，到今天的“文科无用论”和“新文科”的设想，文科始终在批判与重建中、在现代知识体系中寻找定位。当下中国既需科技硬实力，亦需文化软实力——若将文科简化为“无用”，恐怕误掉的不仅是学科，更是文明自省与创新的根基。

可以说在此问题上，人工智能体给出的姿态和回答恐怕比大部分社会大众要高明和周全得多。它甚至把高等教育顶层规划的“新文科”与抵制“文科无用论”铆合到一起，敏锐地判断这是文科“在批判与重建中、在现代知识体系中寻找定位”。当然说既需硬实力，也需软实力云云，则是AI惯常的一碗水端平的四平八稳的算法风格。

AI高屋建瓴的回答固然无懈可击，但是作为一个具有思考能力的个体，笔者仍然想从自身经验出发，来讨论数智技术背景下人文学科教育的价值。

当下的数智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广泛使用确实对传统的知识进路带来了颠覆性的影响，人文学科中的知识记忆、语言翻译、程序性的文献整理等很大一部分任务可以由AI承担。由此激发了大众的想象，即人文学科的知识和相应的工作任务完全可以由AI来承担，主体不再需要学习和掌握。但是如前所述，这一认知是错误的。文科知识技能中的一部分，AI可以掌握，但并不意味着文科教育的全部内容都可以由AI承担，就像计算器可以承担数字运算，但是没有人会认为数学知识整体可以由计算器完成。今天我们普遍认可的是，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条件下，个体的批判性思维、知识品位、共情能力、知识整合能力和知识迁移能力等依然是主体需要具备的，而且较以往其重要性变得更为突出，这些能力很大一部分是要通过文科教育来习得的。比如，批判性思维和知识品位决定了个体能否不受信息矩阵的束缚，在海量信息中选取较好的知识来丰富自身的建构，其内核是主体的价值取舍和

意义建构，这并非可以全部外包给人工智能体来完成。在人文学科的学习中，经典文本的阅读，审美品位的形塑，基于语文能力和逻辑思维的分析、反驳与论证，这都是培养批判性思维 and 知识品位的必要路径。此外，在数智时代，信息的交流大量通过互联网终端实现，主体间的交互关系被弱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变得不再重要，实际上人机交互的底层仍然是人与人的交互关系，因此共情能力在数智时代变得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重要。细致的观察，情感的培养，倾听和理解，这并非具体的技能或技术知识，而是基本的主体能力，是在人文学科教育中培养而成的。

对于数智时代的共同体生活而言，人文学科的教育和研究更加不可或缺。今天新技术成果正以前所未有的高速不断涌现，并且迅速产业化进入日常生活，从而改变我们的认知和行为。但是如何在制度和伦理上恰当地面对和规范新技术，为新技术提供伦理和规范，使得技术具有“善良意志”，能够造福于大部分人而非加剧社会的不公，这些讨论很大程度上涉足了伦理学、政治哲学、社会学、法学等文科知识范围，需要人文学科的深入研究和讨论。此外，具有广泛认可度的新技术的伦理和规范，需要在社会和公众中展开广泛的讨论，其前提是公众首先要理解新技术的内容和效用，其中就需要大量的科学普及和传播工作，这很大程度上也是人文学科的任务。

对今天的大学教育而言，数智时代的学习者需要具备的是与传统知识框架 and 知识进路不同的能力和技能，这就需要建构全新意义上的通识教育，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就是文科教育，尤其是人文学科中的基础学科教育。近年来教育部提出的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四新”建设给予高等教育本科阶段的交叉学科建设、通识教育更大的想象空间。我们传统的专业划分，更多是在教师端，但对于学习者而言，未来的知识进路不应因循旧有的知识框架。随着人工智能体的出现，知识的获取和持有已经最大程度上

实现外包，只要有智能手机等信息终端，海量的信息和知识随时可以按需调取。那么未来的学习对于学习者而言，更多的是主体学习能力、知识迁移能力、知识品位、人机交互能力等的养成，这些能力并不是某一个单一专业的教育能够承担的，而是需要在各个不同知识领域的广泛学习。在这个意义上，在未来的教育中，知识进路和探索方式均应当从根本上加以重新考虑，文科、理科、工科等的传统专业划分将不断模糊乃至消失。在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中，学习者的自主性将进一步强化，主体全方位的能力和品位建构将成为教育的目标和方向，而不是学习者从头至尾被某一具体学科或者专业定义。因此，数智时代的教育将成为一种更加全方位和全领域之事，是以时代问题和现实问题为导向，以主体学习能力和知识品位的塑造为导向，而不是以专业划分的条条框框为前提。任何基于传统的和目前高校内部的知识划分架构，刻意突出文科和理科、理论和实践、学术研究和技术创新之间对立的企图，其实质都是对未来知识整体变迁趋势缺乏远见的认知误区。在这个意义上，包含人文学科教育在内的数智时代的通识教育，应当充分预见和考虑到新技术推进下知识系统和结构的重大变迁，以学科专业融合、实践和问题导向来推进自身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像“四新”建设这样致力于科际融合和交叉学科建设的意图，应当反映高等教育知识系统彻底自我更新的决心：学科交叉不是之前传统知识系统和学科划分的点缀和加法，不是基于原有的各专业学科的建设，在边缘处和前沿处推进研究重叠和共同领域的生发，而是整体上打破19世纪以来的知识系统中的学科专业划分，以前所未有的自由想象力重构人类知识系统和高等教育进程，从根本上改变未来的知识组织方式。

余论：数智时代的新文科

今天的新文科建设，应当有两个基本点：一个是上述科际融合和交叉研究，由此引出对于数智时代重构知识体系的想象空间；另一个则是聚焦于当

代中国语境下的文科发展，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与去地域化、去时间性、去文化性的自然科学研究不同，人文学科的研究和教育植根于历史、语言和特定空间背景，与个体和共同体牢牢铆合在一起，与特定的时代及文化传统密不可分。今天的中国一方面完成了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踏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同时我们又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在这样的时代大势下，人文学科的研究和教育如何能够在筑牢道路根基、打开创新空间、巩固文化主体性、增强文化自信、扩大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等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就是中国新文科建设的核心要务。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这为中国新文科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方向，也强有力地论证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发展人文学科的意义和价值。

此外，以人文学科的自我革新为切入口，我们还可以对新技术时代的大学教育模式做更多的想象。在我们当下身处的“加速时代”，由于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知识的快速更新，在大学学习的专业与未来职业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松散，专业与职业之间不再有精准的对应。在高等教育阶段选择专业，未来职业可能性不再是必要的考量，因为专业知识和职业类型更新淘汰的速度越来越快。在大学的四年或七年学习的某个专业，在完成学业时可能已经过时了，或者该专业对口的职业赛道已经消失了。因此，未来的高等教育学习更多的是培养知识迁移能力和学习能力、知识品位等，而具体的职业技能则需要在工作实践过程中不断学习。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专业或职业的时效性正在大幅缩短，因此以“就业前景不佳”来贬低人文学科等特定知识领域，实

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

在这个意义上，新的大学教育的功能就不再局限于为年轻一代提供职业预备培训，而更多的是为所有人提供终身学习的机会。数智时代的人工智能体和机器人将承担越来越多的人类劳动，而生命科学又在不断延长人的寿命，终身学习将成为每个个体建构有意义人生的重要步骤，这是未来大学教育的重要部分，也是缓解正在发生的社会少子化带给教育的冲击的有效路径。当个体在没有就业压力的闲暇时光里重回大学校园学习以期获得充实感时，人文学科会成为大部分人的选择，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的学习能起到抚慰人心、安顿生命的作用。而传统意义上的专业教育在未来会进一步收缩为少数人的精英教育，为相关领域的终身学习储备师资。

从未来社会建构的层面，我们有必要保持和积极拓展知识系统和教育内容的多元性。不仅自然科学知识、工程技术知识需要被教授和学习，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知识作为人类知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部分。通过知识和教育的多元性建构，描绘认知世界和人类自身的多元路径，将有助于实现社会价值和意义系统的多元性，克服科学意识形态导致的单一价值和单一意义系统，克服优绩主义裹挟下的“内卷”，建设具有包容性的多元社会。在这一向度上，人文科学研究和教育的公共性又被凸显出来。面向未来的人文学科如何积极适应时代发展、恢复公共属性，积极参与时代观念的建构，推动技术向善，平衡人与技术的共生关系，这都是我们需要共同面对和参与的任务，也是人文学科研究论域内的话题。

作者简介：王俊，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现任浙江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外国哲学研究所所长

文章来源：《新文科教育研究》2025年第2期，第33-41页。

复旦大学：开复旦文科新局

在复旦大学120年的办学历程中，文科始终是学校的核心竞争力所在，被誉为滋养学术生态的“老根”。这一“老根”既要深扎土壤，更要汲取养分、持续生长。面对时代挑战，复旦大学以新文科建设为抓手，坚定推进文科转型升级，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以“三个创新”为遵循“做精文科”，实现党的创新理论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同向同行，重大理论创新和重大现实问题研究同频发力，学术范式创新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同步推进。

一、筑牢根基与技术赋能的双向探索

复旦大学人文社科领域以“守正创新”为核心，通过夯实学术根基、拥抱技术变革，推动传统学科与时代需求深度融合，构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夯实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根基。学校党委成立理论工作组，全面推进一流马克思主义学科群建设，整合宣传理论部门、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及各有关学科的团队资源，办好《复旦马克思主义评论》，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多学科研究。实施“主干学科+特色方向”双轨推进，构建“经典诠释—现实观照—前沿探索”三维学科体系，推动人文社科基础研究与应用领域、理论创新与现实实践融合，服务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夯实研究平台与成果积淀。学校加强文科实验室建设，组建人文社科实验室战略咨询委员会，出台《人文社会科学实验室管理办法》，深化国家发展与智能治理综合实验室建设；着力打磨“传世之作”学术精品，如中国语

言文学系《唐五代诗全编》（50册）、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大清一统志》点校本（30册）等标志性文献整理成果，推进“中华早期文明跨学科研究计划”“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加强“当代中国话语”创新研究，促进文化传承与知识共享。

“如果说新工科是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交叉学科，新文科则是解决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交叉学科。”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裘新表示，复旦文科需提升服务党和国家大局、参与引领学术范式变革能力，直面中国式现代化实际，协同各学科运用新方法工具，基于实证研究作出精深管用的阐释。

二、以交叉融合重构人才培养体系

复旦大学新世纪教育教学改革3.0版于今年5月30日正式发布，复旦大学校长助理、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陈焱指出，此次改革将实现“三个所有”：所有学科全面重塑人才培养体系，所有学位项目系统改革培养方案，所有本研课程逐一优化更新，标志着该校在人才自主培养领域进入系统性改革阶段。

招生结构优化：交叉学科占比达20%，新文科成核心增长极。从2025年本科招生计划来看，复旦大学3820名招生总量中，人文社科、理科、工科、医学及交叉学科五大板块占比分别约20%，各学科领域实现均衡布局。其中，交叉学科板块以新文科、新工科为核心驱动力，新文科招生规模超过350人，成为交叉融合人才培养的主力方向。

该校相关负责人表示，文科招生总规模的小幅调整，主要源于高考文科学源结构性减少及部分传统热门专业社会需求收缩，但文史哲等基础性学科招生规模保持稳定。与之相对，新文科培养项目及名额投放显著增加，已成为交叉学科门类的核心构成；在面向2025级本科生新设的120个培养项目中，交叉方向项目达53个，其中由人文与社会科学主导的项目27个，占比

超50%，凸显文科在交叉创新中的重要作用。

培养体系创新：以本研融通构建“完整有机体”。复旦大学将大学教育定位为“完整的有机体”，教育教学改革3.0版以本研融通为人才自主培养体系的骨架，将本硕博各学段通盘考虑，目标直指造就原始创新拔尖人才与交叉融合创新人才。

文科门类本研融通培养项目普遍强化新文科训练，文科院系培养项目的新文科渗透率将超55%。几乎每个文科院系布局双学位项目：如外文学院牵头设立8个“外语+计算机”双学士学位项目，推动语言学科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新闻学院联合人工智能、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设立7个双学士学位项目。2025级学生进校后，如有志趣、有能力攻读双学士学位，可根据院系相关要求提出修读申请。

学科交叉成为复旦文科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复旦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金力过去十年间联合语言学、人类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团队，组建现代语言学交叉研究中心，构建汉藏、南岛、侗傣等语系源流框架，并与遗传信息比对互鉴，在全球人群迁徙规律解析领域取得多项突破性成果。

“学科融合是涵养创新的核心土壤。”金力说，“我们将通过文理交叉、文工结合、文医融通，催生新的学科增长点，进一步擦亮复旦文科品牌，巩固其优势地位。”

三、系统性创新提升人才核心竞争力

复旦大学以课程体系重构为核心抓手，推动教育教学改革向纵深发展，通过跨学科融合、结构性优化与实践导向培养，着力提升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适配性。

面对新时代人才需求，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以下简称“国务学院”）推进课程改革，通过“加减法”组合拳实现知识体系全面升级：改革更新课

程 78 门，新增不少新兴领域课程，形成覆盖本研各阶段的新型课程生态。“学院摒弃‘立新不破旧’的局部修补思路，采用结构性改革路径，以系统集成思维重塑课程知识体系。”院长苏长和说。

改革聚焦“夯实基础”与“前沿引领”双目标，设计两类核心课程模块：一是基座课程，涵盖思想理论、制度纵横、中外比较、政策研习、实践能力、思维方法六大模块，筑牢学生专业根基与结构性知识框架；二是天线课程，瞄准学科前沿动态与国家战略需求，构建进阶式高阶知识图谱，推动理论学习与现实问题解决能力衔接。

以政治学本博贯通项目为例，原国际政治专业核心课《全球治理概论》经系统性改造后，首次纳入政治学与行政管理专业基础课程体系，同步新增《计算社会科学》等交叉课程；本研融通方案下，本科高年级进入本研衔接阶段，培养方案新增《政治修辞学》《博弈论》《田野调查方法》《政策推演与模拟》等课程，搭建知识转化与能力培养的方法论桥梁。

双学位项目拓宽交叉培养路径。国务学院积极探索“专业+技术”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行政管理+人工智能”双学士学位项目即为典型实践。2024 级国务学院本科生陈钰泉通过院系选拔，已正式开始修读这两个跨度较大的学科。他修读的双学位培养方案不仅整合两专业核心基础课程，还开设《人工智能与国家治理》《AI 赋能的政务服务再造》等特色进阶课程，旨在培育兼具技术创新能力与治理素养的复合型人才，为学生提供多元发展路径。

针对传统专业面临的结构性挑战，经济学院以学科交叉为突破口，通过跨学院协同、培养方案迭代，推动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深度对接。

近年来，由于全球经济环境变化与社会需求结构调整，国际贸易学科面临新的挑战。在此背景下，经济学院于 2022 年主动推进学科转型，联合大数据学院开设“国际经济与贸易+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本科双学位项目。

该项目聚焦中国制造业升级背景下大宗资源保障与交易安全的战略需求，定向培养兼具大数据技术能力与国际贸易规则素养的复合型人才，一经推出便获得企业高度关注，首批毕业生已成为行业人才储备的重点对象。

经济学院2022级本科生严瑞琪是该项目首届学生。“面对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跨界学习显著拓宽了我的认知边界，系统掌握经济学与数据科学的复合知识体系，为我提供了更多元的职业发展选择。”她说。

为进一步深化交叉融合，经济学院计划新增“财政学+人工智能”“药学+经济学”等本科双学位项目，形成覆盖经济、管理、理工、医学等多领域的交叉培养矩阵。与此同时，数字经济专业硕士项目已正式获批，标志着学院构建起“本科双学位-专业硕士”贯通的复合人才培养体系。

“我们致力于推动所有专业与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合，构建面向未来产业需求的新型人才培养方式。”经济学院院长张军表示，通过课程重构与学科交叉，学院正逐步实现从“单一知识传授”向“复合能力培育”的转变，为学生应对未来挑战奠定核心竞争力。

作者简介：吴振东、陈潇雨，《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文章来源：《瞭望》新闻周刊2025年第37期

中国人民大学：承时代之问 建中国之学

人工智能技术浪潮正深刻影响各行各业，重构教育生态与人才培养模式。以人文底蕴见长的高校，如何回应数字时代对文科教育的新要求？如何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

承时代之问，建中国之学。被誉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领域一面旗帜”的中国人民大学（简称“人大”），在技术变革中积极“破壁”“立新”，以强烈的使命感与创新精神，全面推进新文科建设，探索人文社会科学与前沿科技深度融合的自主发展路径。

一、学生成为知识生产主体

课程是教学的核心载体，重塑课程体系是人大新文科改革破局的关键支点。

为应对人工智能对传统教学的冲击，人大构建以“I-STAR”为核心的智慧课程体系，搭建“AI+”创新立交桥，推动文科教育从“以教为中心”转向“以学为中心”“以学生为主体”。该体系涵盖“AI+”创研课、技术平台课、思维启蒙课、学科融合课与AI时代的教育使命五大层次，核心是让学生从学习者转变为研究者和创造者。

“AI+”创研课是该智慧课程体系的核心，以学生自主探索为主、教师精准指导为辅，采用团队协作形式。课程贯穿选题、申请、实施到评价全流程：学生凭兴趣自主申报、自组团队，教师提供选题指引并全程跟进指导，通过研讨、开题、中期及期末答辩，提升探究式学习能力。这意味着学生对“学什么、怎么学”拥有充分自主权。

哲学院 2021 级本科生石耘宇参与的“爱(AI)伴行”项目颇具代表性：团队 6 名学生横跨哲学院、信息学院、数学学院，聚焦现实需求，引入 V-IRL 平台智能设计娱乐方案，通过消费者需求关键词策划个性化活动，满足日常娱乐出行需求。

石耘宇说，最初仅想体验创新课程，却在项目中获得高度自主权——学校不仅提供指导教师选择、硬件设施等支持，更让团队全程主导选题至实施。“这让我们真切感受到，文科生也能在 AI 领域发挥独特价值。”

外国语学院 2022 级法语专业本科生张腾裕，因对数学有着浓厚兴趣，加入“魔方数学原理形式化与 Lean 游戏构建”研究团队，将自主学习的抽象代数知识与学术实践积累的编程经验深度结合。更因法语专业优势，他高效处理项目中大量法文参考资料与讲义，成为团队推进的关键力量。

两位学生的实践，正是人大“以学生为主体”教学改革の生动注脚：拆掉学科“围墙”后，跨学科协作与自主探索正让知识生产的主角真正回归学生。

“AI+”创研课以文理交叉、学科融合为特点，发挥人工智能技术优势形成“AI+”学术群落，是人大跨学科融合与学生主导学习的重要探索。人大教务处相关负责人表示，创研课让学生成为学习主体，锻炼创新与实践能力，打造教学相长的育人新机制。

二、打造育才新模式

为对接人工智能浪潮与国家战略需求，人大近年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构建多层次、多类型培养体系，以“文文交叉、文理交叉”融合为核心路径，设立全国首个“智慧治理”本科方向，打造“人工智能与数字社会”“数字法学”“区块链与数字经济”“数字人文”等 19 个荣誉辅修学位项目，及“涉外法治”“金融科技”“社会学—信息资源管理”等 20 余个双学士学位项目。

数字人文系立足交叉融合，探索建立全国首个“数字人文”本硕博贯通

培养体系，创设 42 门专业课程，以“北京记忆”“记忆高迁”等标志性项目为牵引，构建“科研带动实践、项目反哺教学”的产教融合机制——成果持续亮相国内外学术舞台，既锻炼学生实践与研究能力，也推动数字人文成果技术转化与应用落地。

“我们以数字人文系教师为主体，吸纳信息技术、信息资源管理、人工智能、数字媒体艺术、文化遗产等多学科领域导师参与。”数字人文系主任梁继红表示，优质跨学科研究团队为各层次人才培养提供了坚实的跨学科教学保障。

大三学生于凯胜参与了“社会学—信息资源管理”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的学习。“这个文理融会贯通的双学位项目，打破传统范式，运用信息资源管理的相关技术手段去解决社会学研究中遇到的问题，拓展了我的研究广度与深度。”

为打破学科壁垒，人大推出“四年无时点专业选择”机制，文学院、经济学院、新闻学院等 10 余个学院的学生可自主选择院内课程，毕业前根据培养方案完成情况认定本科专业；学生还能跨学科或跨专业选课，达到要求即可申请辅修学位或专业认证，充分自主规划学业路径。

跨学科培养的实践为人才培养体系升级提供范本，2025 年人大进一步将院系探索升级为全校性战略布局，全面优化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项目体系。新体系聚焦国家战略与社会急需，明确班型分为三类：拔尖人才班、创新人才班和战略人才班。

其中，战略人才班瞄准国家战略急需领域，设“涉外法治战略人才班”“国际新闻传播战略人才班”“中意美三学位管理学战略人才班”，旨在通过汇聚国内外优质资源实施超常规培养，以“用中学、干中练”模式，培育具备创新意识、实战能力与国际竞争力的尖端人才。

“我们组织涉外法治专业学生赴义乌开展实践实训，这既是法学教育模式创新、推动理论与实践融合的尝试，更是服务国家涉外法治建设战略的具体行动。”人大法律专业学位教育中心主任姚欢庆表示，学生在实践中了解国情社情，在服务大局中提升专业能力。

人大教务处相关负责人表示，学校秉持“以学为中心、以学生为主体”理念，通过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项目、求是学术训练、全员书院制等举措，精准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构建以学生成长为核心的育人生态——不仅关注知识获取，更注重创新能力、研究能力与国际胜任力的全面塑造。

三、助力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从薪火相传的文史哲研究，到智慧治理、数字人文等前沿领域的开拓，人大始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依托“独树一帜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优势，正形成知识体系构建与人才培养实践深度融合、同频共振的发展新格局。

面对新时代对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的更高要求，人大校长林尚立表示：“AI 对人文社科是重大机遇。人大将人文社科与新技术结合，‘AI+ 文科’前景广阔——我们不视其为挑战，而是赋能。”

以“独树一帜的人文社会科学”为整体建设目标，人大系统构建起“引领的马克思主义学科、卓越的人文学科、顶尖的社科学科、新质的理工学科和创新的交叉学科”五位一体学科布局，以技术赋能人文、交叉引领创新，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注入新动能。

学校紧密追踪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动态，重点建设新时代智慧治理国家级学科交叉中心，打造适应数字时代的云端共享基础设施技术支撑与新型科研机构平台，搭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数字创新平台，通过结构性创新打破学科壁垒，强化创新引领，精准对接国家重大需求，

以高质量研究助力国家高质量发展。

学术创新和知识产出是检验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成效的重要标准。近年来，人大深入实施“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建设工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工程），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推出一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成果。例如，《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十卷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丛书英文版（30卷）、“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丛书等标志性成果，向海内外阐释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科学内涵。

在此基础上，学校创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成果发布会”机制，至今已举办九场，发布五十余项覆盖哲学、法学、金融学、新闻传播等多领域的重大原创成果，形成兼具学术影响力与社会效应的品牌；发起成立“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大学联盟”及学科联盟，联合高校优势力量形成研究合力；通过密集举办学术活动，搭建起融通中外的学术交流发布平台，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中国理论、中国思想。

智库建设与社会服务领域同样成果丰硕。以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式现代化与文明新形态研究院、区域国别研究院等为代表的智库平台，近年在国际传播、绿色金融、“一带一路”研究、全球治理等领域产出大批具有重大政策影响力的成果，成为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力量。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关乎文化自觉与时代使命的重大工程。我们要立足中国、放眼时代，持续推进知识、理论与方法创新，让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人大党委书记张东刚表示。

从课程体系重构到交叉平台搭建，从理论创新到成果转化，从人才培养到国际发声……在数字化浪潮中，这所传承红色基因的现代化大学，正高举

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旗帜，稳步探索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新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学理支撑与人才保障，彰显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底气与自信。

作者简介：鲍赫、魏梦佳，《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文章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2025 年第 37 期

发展规划处、学科建设办公室

文中转载文章版权归属原作者，如涉侵权，请联系删除。



发展规划处、学科建设办公室

北京市丰台区花乡张家路口 121 号，邮编：100070

官网：fzghc.cueb.edu.cn

E-mail: guihua@cueb.edu.cn